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玉器编

1

新石器时代

紫禁城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编委员会主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亚民 王 素 纪天斌 刘 雨 李文儒 李辉柄
陈丽华 肖燕翼 杨伯达 杨 新 杜迺松 张忠培
陆寿麟 单国强 郑珉中 段 勇 施安昌 晋宏逵
耿宝昌 徐邦达 聂崇正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Editorial Board

Director Zheng Xinmiao

Deputy Director Li Ji

Members

Wang Yamin Wang Su Ji Tianbin Liu Yu Li Wenru Li Huibing

Chen Lihua Xiao Yanyi Yang Boda Yang Xin Du Naisong Zhang Zhongpei

Lu Shoulin Shan Guoqiang Zheng Minzhong Duan Yong Shi Anchang

Jin Hongkui Geng Baochang Xu Bangda Nie Chongzheng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玉器编

1

新石器时代

故宫博物院 编

紫禁城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玉器编. 1, 新石器时代/故宫博物院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398-2621-9

I. 故… II. 故… III. ①故宫博物院—历史文物—北京市—图集②古玉器—中国—新石器时代—图集 IV. ①K870.2② K8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5477号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玉器编 | 新石器时代

故宫博物院 编

主 编: 张广文

编 委: 徐 琳 赵桂玲 许晓东

杨 捷

摄影统筹: 冯 辉

摄 影: 刘明杰 胡 锤 冯 辉

刘志岗

翻 译: 宋玲平

编辑统筹: 陈丽华 王亚民 赵国英

责任编辑: 万 钧 郑 可

装帧设计: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责任校对: 司开江 史春霖

英文校对: 张楚武 陈芳芳

责任印制: 马静波 李建森 徐海燕

出版领导小组

主 任: 王亚非 王亚民

副 主 任: 田海明 林清发

委 员: 郑 可 赵国英 唐元明

丁怀超 贾兴权

项目实施小组

主 任: 林清发

副 主 任: 武忠平

成 员: 谢育智 陈 涛 马晓芸

黄 伟 姚 健 刘 辉

陈连营

出 版: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总经销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14 层

邮 编: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604 0551-3533607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 张: 39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98-2621-9

定 价: 6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安徽美术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JADE

1

Neolithic Age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Time Publishing and Media Co., Ltd.
Anhu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总目

总序 郑欣淼 _____ 8

凡例 _____ 24

前言 张广文 _____ 26

图版目录 _____ 37

图版 _____ 49

图版索引 _____ 285

Contents

General Preface to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i>Zheng Xinmiao</i>	15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Compendium	25
Foreword <i>Zhang Guangwen</i>	31
List of Plates	43
Plates	49
Index	285

总序

郑欣森

故宫博物院既是明清紫禁城建筑群与宫廷史迹的保护管理机构，也是以明清皇室旧藏文物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收藏、展示和研究机构。故宫博物院以其颇具皇家文化特色的文物藏品，在中国以及世界博物馆界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一 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来源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品类丰富，体系完备，可划分为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共 25 大类、69 小项，计 150 多万件（套），截至 2006 年底，占中国文物系统博物馆藏品总量的 11.5%；其中一级文物 8 273 件（套），占中国文物系统博物馆藏品一级文物的 1/6。

在故宫博物院的 150 多万件（套）文物藏品中，有 130 多万件（套）是清宫旧藏和遗存，占藏品总数的 85%，其余 20 多万件（套）为建院以来的新收藏，占藏品总数的 15%。清宫旧藏和遗存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代皇家收藏的承袭。中国历代宫廷都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和《四库全书总目》等，是清乾隆时期编辑的宫中所藏古铜器、书画、图书的目录。见于著录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

但也有不少珍品几经聚散, 历经沧桑, 保存到今天。例如, 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 都曾载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石渠宝笈》中, 现仍藏在故宫。这部分藏品是中国皇家收藏传统的延续。

【二】宫廷制作。为了满足皇室对宫廷日用器皿及各种工艺品的需要, 清宫内务府一直设有造办处, 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高超的工匠, 在宫廷内制作各种物件, 均不惜工本, 精益求精。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 造办处曾设立有匣作、裱作、画作、广木作、穿珠作、皮作、绣作、镀金作、银作、玉作、累丝作、鍍花作、镶嵌作、牙作、砚作、铜作、做钟处、玻璃厂、舆图房、弓作、鞍甲作、珐琅作、画院处、木作、漆作等38作, 后将一些活计相近的合并, 共为15作, 后又有所调整。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的手工业工场, 常年按照御旨制作独具清代皇家风范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各种精美的日用品。还有些器物由造办处设计画样, 或拨蜡样或做木样, 交苏州、扬州、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相关部门, 由当地最优秀的匠人制作。遗留至今的很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如玉器、珐琅器、钟表、文玩等, 其中不少都是当年造办处制造的。造办处的档案保存至今。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有许多仍可以在档册中找到作者是何人, 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 某日完成, 以及陈设地点等。

【三】进呈及查抄没收物品。专制时代帝王一家天下, 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 臣工往往多有贡献, 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续编·序文》中说:“自乙丑至今癸丑, 凡四十八年之间, 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 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石渠宝笈三编》嘉庆皇帝的上谕中又说:“朕自丙辰受玺以来, 几暇怡情, 惟以翰墨为事, 阅时既久……至内外臣工, 祝嘏抒诚, 所献古今书画亦复不少。”清宫书画, 臣工所献占一大部分。书画如此, 其他珍宝也进献不少。除国内进献外, 还有藩属国贡品、外国礼品等。这些所进之物, 往往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查抄没收物品也是重要来源。如康熙初期权臣明珠藏书数万卷, 宋元版及名贵抄本尤多, 其藏书处所为“谦牧堂”。明珠去世后, 其子因罪被追夺官位, 削谥抄家, 家藏古书名画等尽入内府。嘉庆二年(1797年)重辑《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时, 原“谦牧堂”书便是入选的重要对象。又如高士奇、毕沅, 都身居高位又精鉴赏, 家藏书画古帙甚富, 后也均被抄没入内府。

【四】清宫编刻书籍。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宫秘籍为基础, 又经过数百年的搜求, 加上清宫的编纂刊刻、抄写各类图籍, 其收藏之富, 超越以前各代。在清代, 特别是清前期, 内务府

主持编纂、刊行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这些图书不仅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成为清宫藏书的重要来源。康熙时把武英殿作为清代内府专门的修、刻书机构。康、雍、乾三朝，内府编刊了大量图书。由于康、乾二帝崇尚书法，内府抄写书籍亦极为盛行，其抄写之精、装帧之美、数量之大，均可与内府刊本书相媲美。这些内府刊本与内府抄本，都成为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

故宫保存了大量清宫衣食住行的用品，当时并不是收藏品，而是实用之物，但在今天看来，同样是宫廷历史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又由于是皇室日常生活用品，制作都十分讲究，也有着相当高的艺术价值。这批物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例如宫灯、乐器、车马轿舆、明清家具、戏衣道具、服饰衣料、地毯以及金银器、锡器、铜器，甚至梳妆具、玩具、茶叶、药材、药具等，都是清古典制及文化娱乐活动的反映，具有文物的意义。

清宫旧藏，至乾隆年间最为丰盛，以后随着国力衰败，外患频仍，收藏日渐式微，特别是近代以来，清宫文物珍藏更是多次遭到劫掠或毁损。比较大的厄难有三次：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野蛮劫掠和焚毁；第二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第三次是清逊帝溥仪“小朝廷”时期对宫廷文物的盗运，以及1923年建福宫花园大量文物珍宝的付之一炬。1924年底驱逐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及以后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对清宫物品进行了初步点查，整理出版《清室善后委员会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册，计有文物94000余号，117万件之多。这些文物就成为于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当然，清宫旧藏及遗存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当时有些殿堂尚未清点，清点过的一些物品，因计算方法的原因与实际数量亦有不少出入。文物清理也就成了故宫博物院一项多次进行的工作。据估计，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清宫旧藏及遗存最少在700万件以上。

为防止日本侵略者的掠夺，1933年，故宫博物院的数十万件文物迁移到中国南方，抗日战争中又转运西南。在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1/4送往台湾，共约60万件，其中书画器物约5万件，典籍近17万册，文献档案约38万件，1965年在台北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方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努力充实文物藏品，经过数十年积累，古老的皇宫不仅重现昔日收藏颇丰的盛况，而且补充了更多的过去皇宫所没有的精美艺术品，使其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文化艺术品最为宏富的宝库。

充实文物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府拨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接收政府部门和各地博物馆拨交的文物达16万件（套），有许多是原清宫旧藏后来流失出去的，如当年溥仪抵押给盐业银行的玉器、瓷器、珐琅器、金印、金编钟等。50年代初，中央政府先后从香港买回著名的“三希”中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以及韩滉《五牛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赵佶《祥龙石图》等一大批瑰宝，交故宫存藏。在国家文物局和全国各地博物馆的支持下，众多的国家级珍贵文物调拨到故宫博物院，使得故宫藏品更加丰富、系统。

【二】文物征购。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确定了以清宫流失出去的珍贵文物为主、兼及中国历代艺术珍品的文物收购方针，国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购回了大量珍贵文物。收购的途径主要有文物商店、古玩铺、文物收藏者和拍卖公司等。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故宫博物院购藏文物的高峰期。当时社会上流散文物较多，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得到一件珍贵文物后，首先是送故宫，这就为故宫博物院创造了一个大量购进珍贵文物的极好机会。截至2006年12月底，共购得文物53971件，其中一级文物1764件。这些文物，品类众多，特别是书画珍品，如隋人书《出师颂》，以及唐代周昉、颜真卿，宋代王诜、刘松年、马和之、夏圭、马远、张先、欧阳修、苏轼、米芾，元代顾安、钱选、赵孟頫、迺贤，明代吴伟、唐寅、沈周、董其昌、祝允明，清代原济、赵之谦等名家的作品。

【三】接受捐赠。截至2006年12月底，故宫博物院共接受捐赠文物及文物资料约33900件（套），捐赠人员696人次。捐赠者中，有党政军领导人，有社会各方面专家、学者、艺术家，有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有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专家等。毛泽东主席先后将友人赠送的王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钱东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以及张伯驹赠他的唐李白《上阳台帖》，转交故宫。张伯驹先生捐献的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册》、范仲淹《道服赞卷》，元赵孟頫《千字文卷》等法书巨迹。孙瀛洲先生捐献各类文物精品3000余件，以陶瓷珍品最为重要。郑振铎先生捐赠文物657件，尤多雕塑精品。陈叔通先生捐献的《百家画梅》，凡102家，109幅，有唐寅、陈录、王綦、邵弥、原济及扬州八怪等明清诸家的杰作。新加坡华侨韩槐准先生捐献了他毕生收集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填补了故宫陶瓷藏品中的缺门。香港叶义先生捐献的81件犀角雕刻品，全是明清犀角雕刻精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及机构也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档案馆划出故宫

博物院。明清档案在故宫文物藏品中占有重要位置。1955年2月,故宫档案馆移交国家档案局;1969年底,又交归故宫博物院;1980年4月,藏品已逾800多万件的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再次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期以来是个重要的业务部门。1949年以后,先后将一批宋元善本、明清旧籍和清代殿本书中的“重复本”15万余册拨交给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等16家单位。其中仅1958年拨给北京图书馆的宋、元、明善本书即有69510册。至此,清代宫中藏书再一次分散于全国各地。

故宫博物院原有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虽已拨交给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及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建筑图样和烫样、舆图等特藏文献,以上共计195000册(件)。另有23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

从1949年至1980年前,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充实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也先后把84000余件文物调拨给不少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例如,故宫博物院曾把包括《乾隆南巡图》、魏季子白盘等在内的3781件珍贵文物拨给了195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把一部分官窑瓷器赠给了一些古窑址博物馆。在一些寺院和我驻外使馆等,都有被调去或借用的故宫文物。也有一些清宫文物被赠送国外博物馆,例如1957年赠给苏联东方博物馆清代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器、织绣等文物550件。此外,南迁文物尚有10万余件滞留在南京博物院。

二 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价值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丰富多彩,品质精美,具有经典性、系统性与完整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故宫文物具有国宝的意义。中国皇室收藏有着悠久的历史。皇室收藏具有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皇室收藏文物,不仅因其是稀有的珍宝或是有重要价值的艺术品,而是更重视这些文物所寓有的某种至高德行的含义,认为它的聚集是天命所归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收前朝的旧藏,表示着它继承前朝的天命。清代皇室收藏为历代之顶峰,也是历代皇室收藏的

总结。在反对帝制复辟背景下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把清宫藏品视为文化传统的结晶、整个民族的瑰宝，把对它及故宫博物院的维护与坚持民主共和政体等同起来。在以后艰苦卓绝的文物南迁中，故宫藏品的国宝形象进一步得到提升和加强。文物南迁，开始也有许多人反对，但大家最后认识到失去的领土可以收复，而几千年的文明，作为文化传统的结晶，得之不易，能否保存下去，关乎民族根基的坚持与民族精神的传扬。最终，民众达成了尽力保护国宝的共识。在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随着人们对故宫价值以及故宫作为文化整体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国宝不只是故宫的一件件具体的文物，整个故宫就是一个巍然挺立、价值无比的国宝，是民族文化传统最有代表性的象征。

故宫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宝库。在故宫 150 万件（套）文物中，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论范围，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明精华，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别，包含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故宫度藏的各主要类别文物，其本身就完整地记录了该类文物从萌生、发展到辉煌的文化链。以书法为例，故宫的藏品涵盖了从契刻到书写进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的历程，藏品从甲骨文、钟鼎文，直至晋朝开始形成书法艺术，此后，历朝各代的名家流派，几乎一应俱全。再以陶瓷为例，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彩陶，直到两宋的五大名窑，元代青花瓷，明代白瓷、釉里红、斗彩等，清代的粉彩和珐琅彩等。其他如玉器、铜器和许多工艺品等，也是如此。为了这条历史文化长河永远奔腾流淌、润泽后代，故宫还在收藏现当代的艺术精品。因此，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故宫藏品与故宫古建筑都是旷世之宝。故宫藏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故宫古建筑的不可分割，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故宫无与伦比的价值以及故宫博物院的丰富内涵与崇高地位。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文物藏品因此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宫，在长达 491 年的历史时期，它是封建国家的政治中枢和 24 位皇帝的居所。保存至今的大量宫廷旧藏及其遗存，不仅与故宫不可分割，而且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宫廷历史紧密相联。文物藏品、古建筑以及历史上宫廷发生的人和事，三者是一个文化整体，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故宫学。从故宫学的视野看待故宫的文物藏品，它们不仅在文化史、艺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而且见证了王朝的治乱兴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 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的意义

整理和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文物藏品是博物馆赖以存在和开展业务的基础，藏品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地位及其作用的主要条件。故宫博物院曾进行过多次文物清理，由于宫廷藏品的数量庞大、种类复杂，长期以来，一些底数还不很清楚。只有彻底弄清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种类和确切数量，才能有效实施保护，才能对它的内涵、特点和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这是博物院的基础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基于以上认识，故宫博物院多年来坚持清理文物藏品的工作，并制定实施了《2004～2010年文物清理规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及《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就是文物清理工作的成果体现，是几代故宫人努力的结果，对于让世人了解故宫藏品的奥妙及全貌，更好地为人们的鉴赏、研究等不同需要服务，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故宫博物院曾整理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以及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建筑等多种图录，但出版面世的文物数量仍然相当少，绝大多数不为世人所知。人们难以欣赏到中华文物精粹的灿烂与辉煌，专家学者难以充分利用故宫的藏品资源进行研究，故宫博物院大量藏品的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可使大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物藏品，以先进的制版印刷工艺、高品质的图书形式，系统、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正成为社会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

如前所述，60万件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并出现了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时存在的现状。两岸故宫的文物都主要来自清宫旧藏，同根同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两岸故宫藏品状况的了解，有助于人们对故宫文化整体的深刻认识，尤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们更为全面地领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以及一脉相承。

瑰宝聚集，来之不易；沧海桑田，文明永续。《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的出版，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是21世纪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故宫文化内涵的发掘，对于故宫的整体保护，对于故宫学研究的深入，都会有所促进。

General Preface to Compendium of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Zheng Xinmiao

The Palace Museum is not only 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architectural complex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historical palaces, it is also an institution for storing, exhibiting, and researching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artifacts and ancient works of art, the core of which cam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s of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The Palace Museum, with its almost unique collection of artifacts of dynastic imperial cultur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mong museum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I. Sources of the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artifacts in the Palace Museum feature a wide variety of types and are remarkably complet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enty-five categories and sixty-nine sub-categories, which include ceramics, paintings, calligraphic works, stele rubbings, bronze, jade, jewelry, lacquer, enamel, sculpture, inscriptions, furniture, rare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scholar's items, seal books of emperors and empresses, clocks and watches, military and parade equipment, and religious artifacts. There are altogether over 1.5 million artifacts (or sets of artifacts) in the Museum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t the end of 2006, which represents eleven and a half percent of the objects in all of China's museums. Of these cultural artifacts, there are 8,273 items (or sets) of the First Rank, which amounts to one sixth of all First-Rank artifacts in Chinese museums.

Of the entir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of a million and a half artifacts, eighty-five percent, or 1.3 million artifacts, ar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other more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fifteen percent of the total) were acquired after the Palace Museum was founded in 1925. The cultural artifacts from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primarily came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1) The collections of former imperial dynasties. It wa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for Chinese imperial courts to collect precious cultural artifact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collection was especially large. *Calligraphic Catalogue of Xuanhe Period* (*Xuanhe shu pu*), *Painting Catalogue of Xuanhe Period* (*Xuanhe hua pu*), and *An Illustrated Book Compiled during the Years of Xuanhe on Ancient Bronzeware* (*Xuanhe bogu tu*), are in fact catalogues of the treasures and curios, such as calligraphic works, paintings and bronze vessels, collected by the Song Court during the

Xuanhe's reign. The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collecting. Emperor Qianlong, in particular, expanded the imperial collections to its peak. *Catalogue of the Qing Imperial Bronze Collection* (*Xi qing gu jian*), *Sequel Catalogue of the Qing Imperial Bronze Collection* (*Xi qing xu jian*), *Imperial Bronze Collection in the Palace of Tranquil Longevity* (*Ningshou jian gu*), *Precious Collection of Stone Moat* (*Shiqu baoji*), *Treasured Collections of Mysterious Halls* (*Midian zhulin*), *Treasured Rare Books of the Qing Court* (*Tianlu linlang*) and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are all catalogues compiled under the Qianlong's reign concerning ancient bronze vessels, calligraphic works, paintings, and books collec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lthough many of them are no longer extant, some treasures have been preserved in spite of the turbulent ages and vicissitudes they went through, among which there are famous calligraphic works or paintings such as *Manuscript Beginning with Boyuan* by Wang Xun of the Jin dynasty, *Spring Excursion* by Zhan Ziqian of the Sui dynasty, *Five Oxen* by Han Huang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Night Revels of Han Xizai* painted by Gu Hongzho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All these works of art now in the Palace Museum were recorded in *Calligraphic Catalogue of Xuanhe Period*, *Painting Catalogue of Xuanhe Period* or *Precious Collection of Stone Moat*. They are evidence of the long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at Chinese imperial courts.

(2) Articles made by imperial cour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mperial family, articles of daily use and handicrafts of various kinds were made by highly skilled craftsme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 a branch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No expense was spar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ose articles needed inside the imperial palace. Before 1755, thirty-eight different jobs were listed in the Imperial Workshop, which included box making, mounting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ainting, Guangdong-style woodworking, bead threading, leatherwork, embroidery, gilding, silversmithing, jade carving, filigreeing, chiseling, inlaying, ivory and horn carving, ink-stone making, bronze manufacture, clock making, glass blowing, drawing, bow making, armory forging, enamel making, wood working, and lacquering. Later they were rearranged into fifteen workshops. This was a comprehensive handicraft workshop of a very large scale. Its regular work was to make works of art, handicrafts, and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ll characterized by imperial splendor. Other articles were made by the best local craftsmen of Suzhou, Yangzhou, Nanjing, Zhejiang, Jiangxi, and Guangdong according to design drawings, or models made of wax or wood, provided by the Imperial Workshop. Many consummate handicraft articles handed down, such as jades, enamelware, clocks, and curios, were all made by this workshop. The archives of the workshop,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many exquisite works of art and handicrafts in the Palace Museum, such as their makers, the dates when they were designed, when their design drawings or models were made, and when they were completed, as well as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items were stored.

(3) Tributes presented to the court or objects confiscated. Under the autocratic system of dynastic China, the ruler viewed the whole country as his family. On the occasions of festivals, birthday celebration ceremonies of the emperors or inspection tours,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for officials to present gifts, of which calligraphic works, paintings and curios were most to the emperors' liking. Emperor Qianlong wrote in *Preface to the Sequel of Precious Collection of Stone Moat*, "Over the past forty-eight years, whenever there was a grand ceremony, calligraphic works and paintings, ancient and modern, pre-